



陕西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文史通义》选注

章锡琛
著

中国

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主编
郝振省

西北大学出版社



陕西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文史通义》选注

章锡琛
选注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中国
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主编
郝振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史通义》选注 / 章锡琛著. —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3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 郝振省主编)

ISBN 978-7-5604-4332-4

I. ①文… II. ①章… III. ①文史-研究-中国-清前期 ②《文史通义》-注释 IV. K09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8008号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文史通义》选注

章锡琛 著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 邮 编: 710069

网 址: <http://nwupress.nwu.edu.cn> 邮 箱: xdpress@nwu.edu.cn

电 话: 029-883025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5.375

字 数: 122千字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4332-4

定 价: 5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西北大学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29-8830296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章锡琛（1889—1969），别名雪村，浙江省绍兴马山镇人。近现代出版家，民国时期出版机构开明书店创始人。他1912年进入出版界，任《东方杂志》编辑，并从此供职商务印书馆长达15年。1926年8月1日，章锡琛在上海创办开明书店，从而在中国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9年12月后，章锡琛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处长、专员，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著作权暂行法。后调任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副总编辑。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含冤去世。1988年恢复名誉。

他学术精湛，著译有《文学概论》《文史通义》（选注）、《马氏文通校注》《助字辨略》（校注），还有散见于各报刊上的著译文章近七百篇。

编辑说明

章锡琛是我国现代出版家，《〈文史通义〉选注》是他在1926年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旨在普及文史常识的“学生国学丛书”中的一本图书。

《文史通义》是清代乾嘉学派学者章学诚的史学著作，文言论述，故章锡琛为帮助学生阅读，对文中简称的人名、书篇名、历史故事、典故等加了注解文字。

这次整理重版，改原版竖排繁体字为横排简体字，改正了异体字、俗体字等，纠改了原版中的错讹字词，依现今规范改变了文中篇名书名号、引文的引号等排版符号，以方便今天读者的阅读。

总序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选集张元济等中国现代出版拓荒者14人之代表性作品19部，展示他们为中国现代出版奠基所作出的拓荒性成就和贡献。这套书由策划到编辑出版已有近六个年头了，遴选搜寻作品颇费周折，繁简转化及符合现今阅读习惯之编辑加工亦费时较多。经过多方努力，现在终于要问世了，作为该书的主编，我确实有责任用心地写几句话，对作者、编者和读者有个交代。尽管自己在这个领域里并不是特别有话语权。

首先想要交代的是这套选集编辑出版的背景是什么，必要性在哪里？很可能不少读者朋友，看到这些论著者的名字：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钱君匋、邹韬奋、叶圣陶等会产生一种错觉：是不是又在“炒冷饭”，又在“朝三暮四”或者“朝四暮三”？如此而然，对作者则是一种失敬，对读者则完全是一种损失，就会让笔者为编者感到羞愧。而事情恰恰相反，西北大学出版社的同仁们用心是良苦的，选编的角度是精准的，是很注意“供给侧改革”的。就实际生活而言，对待任何事物，怕的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怕的就是浮光掠

影，道听途说；怕的就是想当然，而不尽然。对待出版物亦是这样，更是这样。确实不少整理性出版物、资料性出版物，属于少投入、多产出的克隆性出版；属于既保险、又赚线的懒人哲学？而这套论著确有它独到的价值。论著者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闭门只读圣贤书”的出版家，而是关注中华民族命运，焦急民族发展困境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他们面对着国家的积贫积弱，民众的一盘散沙，生活的饥寒交迫，列强的大举入侵，和“道德人心”的传统文化与知识体系不能拯救中国的危局，在西学东渐，重塑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固守着民族优秀文化的品格，秉承“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使命，整理国故，传承经典，评介新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出版文化事业进行了拓荒性奠基。如果再往历史的深层追溯，不难看出，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代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胸与志向的使命追求，正如北宋思想家张载所倡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为中华民族这些前仆后继、生生不息的思想家们肃然起敬。以张元济等为代表的民国进步出版家们，作为现代出版文化的拓荒奠基者，其实就是一批忧国忧民的思想大家、文化大家。挖掘、整理、选萃他们的出版文化思想，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之举，也是为新时代实现古今会通、中西结合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的必须之举。

不仅如此，这套论著丛书的出版价值还在于作者是民国时期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文化群体，一批立足于出版的文化大家和思想大家；14位民国出版家的19部作品中，有相当部分未曾出版，具有重要的填补史料空白的性

质，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者、耕耘者都是一笔十分重要的文化财富之集聚。通过对拓荒和奠基了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这些出版家部分重要作品的刊布，让我们了解这些出版家所特有的文化理念、文化视野、人文情怀，反思现在出版人对经济效益的过度追求，而忘记出版人的文化使命与精神追求等等现象。

之所以愿意出任该套论著丛书的主编还有一层考虑在里面。这些现代出版事业拓荒奠基的出版家们，其实也是一批彪炳于史册的编辑名家与编辑大家。他们几乎都有编辑方面的极深造诣与杰出成就。作为中国编辑学会的会长，也特别想从中寻觅和探究一位伟大的编辑家，他的作派应该是怎样的一种风格。张元济先生的《校史随笔》其实就是他编辑史学图书的原态轨迹；王云五的《新目录学的一角落》其实就是编辑工作的一方面集大成之结果；邹韬奋的《经历》中，就包含着他从事编辑工作的心血智慧；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也不乏他的编辑职业之体验；陆费逵的《教育文存》、章锡琛的《〈文史通义〉选注》、周振甫的《诗词例话》等都有着他们作为一代编辑家的风采与灼见；赵家璧的三部论著中有两部干脆就是讲编辑故事的，一部是《编辑忆旧》，一部是《编辑生涯忆鲁迅》，其实鲁迅也是一位伟大的编辑家。只要你能认真地读进去，你就会发现一位职业编辑做到极致就会成为一位学者或名家，进而成为大思想家、大文化家，编辑最有条件成为思想家、文化家。“近水楼台先得月，就看识月不识月”。我们的编辑同仁难道不应该从中得到启发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为自己编辑职业的神圣性而感到由衷的自豪与骄傲吗？

这套丛书真正读进去的话，容易使人联想到正是这一批民国时期我国现代出版事业的拓荒者和奠基者，现代出版文化的

开创者与建树者，为西学东渐，为文明传承，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他们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出版努力，他们所举办的现代书、报、刊社及其载体实际上成为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输的重要通道，成为中西文化发展交融的重要枢纽，成为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寻求和探究救国、救民真理的重要精神园地。甚至现代出版事业的快速发展与现代出版文化的初步形成，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诞生的重要思想文化渊源。一些早期共产党人就是在他们旗下的出版企业担任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的还是他们所在出版单位的作者或签约作者。更多的早期共产党人正是受到他们的感染和影响，出书、办报、办刊而走上职业革命道路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民国出版家及其拓荒性论著的价值重视还很不够。而这套论著丛书恰恰可以对这个问题有所补救，我们为什么不认真一读呢？

是为序。

郝振省

2018.3.20

序

章先生学诚，字实斋，清浙江会稽人。生于乾隆三年（一七三八）戊午，中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顺天乡试举人，次年成进士，于嘉庆六年（一八〇一）辛酉逝世，年六十四岁。先生幼年资质鲁钝，但在十五六岁时，就有志于史学，不肯作应举文字。后来专攻文史，自称对于史学义理，校讎心法，都有独得之见。他的思想，大概俱在《文史通义》《校讎通义》中。当他生存时，每撰成一文，往往把文稿录寄友人，互相传写。到临终的时候，曾把全稿托萧山王宗炎编次。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壬辰，他的次子华绂，刻于大梁，但只有《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讎通义》三卷，还不到全书三分之一。后来谭廷献又刻于杭州，广州伍崇曜也有同样的刻本。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年）戊寅，他的曾孙季真，又重刻于贵州，但编次都照大梁本。到了最近，浙江图书馆得钞本《章氏遗书》，用新法排印，比旧本增加不少。但最完善之本，却要算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壬戌吴兴刘承干所刻的《章氏遗书》。此书共有五十卷，内《文史通义》内篇六卷，外篇三卷，《校讎通义》内篇三

卷，外篇一卷，《方志略例》二卷，文集八卷，《湖北通志》（检存稿）四卷，外集二卷，《湖北通志》（未成稿）一卷，以上凡三十卷，目录大略照王宗炎编次；此外还有外编十八卷，即《信摭》《乙卯札记》《丙辰札记》《知非日札》《阅书随札》各一卷，《永清县志》十卷，《和州志》三卷；再加补遗及附录各一卷。本书便是从吴兴本节钞而来，篇数虽然很少，但实斋先生的思想，也大略可以从这里面窥见一斑了。

先生虽然是前清的一个进士，但生平却没有做过官。不过曾任肥县清漳书院、永平敬胜书院、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正书院等书院的院长，以及做过纂修《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等志书的事业，就靠这些过他的一生。他的著作，除现在所传的《遗书》外，曾襄助毕沅修《续通鉴》，并《史籍考》；但《史籍考》现在失传，不知究竟有否成书。又生平常想重撰《宋史》，但终于没有着手。至于他所修的各种志书，除现在被收入《遗书》的外，也大都不见了。

清代的学术，以考据为最盛；在实斋先生的那时，正是汉学风靡一世的时代。在他以前，如顾炎武、阎若璩、毛奇龄，与他同时，如戴震、钱大昕、惠栋、王念孙、段玉裁等，都尽力研究声韵、训诂、名物、度数，对于经学上有重大的贡献。但实斋先生却自己以为性质不和这种学问相近，独自致力于文史。他在《浙东学术》篇上，很推崇黄宗羲，指出浙东与浙西的不同，是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又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可见他显然以浙东派自居，有与那尚博雅的浙西考据家对峙之意了。

要说明实斋先生的思想，当然不是几句话所能做得到。但大略的说，他的思想，是以道始三人居室论和六经皆史论为中心。中国从前的学问，往往分为考据、义理、辞章三派。三派之中，考据和义理位置较高；至于辞章之学，虽然也肩着文以明道的大招牌，却往往为其他二派所轻视。义理之学，倡于南宋的程朱，到明代王守仁氏，宗仰陆九渊，与程朱别为一派，于是有朱陆之争。这种争执，到清初还颇剧烈。但自从考据家一起，理学家的势焰便不免衰歇。实斋先生的意见，以为这两种学问，实在都很有用处，都足以为明道之资。不过他们的弊害，就在考据家往往舍今而求古，义理家往往舍人事而言性天。这原因就在乎他们虽然都想借以明道，却不明白道之所以为道。在他的意思，道是形于三人居室，著于政教典章，人伦日用，而极于修齐治平。所以第一，道是因时制宜的，不能泥古而昧今；第二，道是切合人事的，更不该空口说空话。这便是他所以异于考据家和理学家的地方。至于辞章之学，在他看来，其足为明道之资，也正和考据义理二者不分轩轻，不过不应该但溺文辞，以及欲借空言以明道罢了。

六经皆史论，也从他的那种道体观出发。因为他以为道就在于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不能用空话来说，所以觉得《易》《诗》《书》《礼》《乐》《春秋》这些书，都不过是三代盛时各守专官的掌故，没有一端不关系于当代的典章政教，没有一端不切于人伦日用，决不是圣人想为了垂教立言而故意作出来的。他用《易》掌于春官太卜，《书》在外史，《诗》领太师，《礼》自宗伯，《乐》有司成，《春秋》各有国史，来证明六经的官守，因以说明孔子的所以述六经，无非想表彰先王的政教及官司典守，以示后人。所以后世儒者，死

守六经，当做一种载道的书，而把天下事物，人伦日用丢开不管，却是大误的。

实斋先生的这种见解，是否错误，现在且不必说。但对于历来儒者支离破碎空疏无用的弊病，不能不说是最好的针砭。

但我们要明白实斋先生的所以有这种议论，完全是想矫正当时的风气。所以我们要知道他的思想，不可不先知道他所处的时代。这便是古人所谓知人论世的方法。他所处的时代是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引他《与沈枫堉论学》书中的话来说明——

前明制义盛行，学问文章，远不古若。此风气之衰也。国初崇尚实学，特举词科；史馆需人，待以不次。通儒硕彦，磊落相望，可谓一时盛矣。其后史事告成，馆阁无事。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余年，学士又以四书文义相矜尚。……今天子右文稽古，三通四库，以次而开。词臣多由编纂超迁；而寒士挟策依人，亦以精于校讎，辄得优馆，甚且资以进身。其真能者，固无力农之逢年矣。而风气所开，进取之士，耻言举业。熊刘变调，亦讽《说文》《玉篇》，王宋别裁，皆考铨容金篆石。风气所趋，何所不至哉？吴兴刘氏本《章氏遗书》卷九第三十六页。

他认为学问的要务，第一在乎矫正风气。他说——

陶朱公曰：“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学业将

以经世，当视其所忽者而施挽救焉，亦轻重相权之道也。同上第三十七页。

又在《天喻》篇说——

故学业者所以辟风气也。风气未开，学业有以开之；风气既弊，学业有以挽之。同上卷六第十一页。

这便是他在考据学盛行时代努力攻究文史，提倡学者应该注重文章事功的原因。此外他的意见，还有可以使人信服的，便是他以为学问贵在自立，不必依傍别人的门户；应该认识自己的性质所近，专攻一门，不必贪多务博，以及趋逐时尚。他在《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上说——

惟夫豪杰之士，自得师于古人，取其意之所诚然而中实有不得已者，力求其至，所谓“君子求诸己”也。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与，虽大如泰山不遑顾也。世之所忽而苟为吾意之所期与，虽细如秋毫不敢略也。趋向专，故成功也易；毁誉淡，故自得也深。即其天质之良，而悬古人之近己者以为准；勿忘勿助，久之自有会心焉，所谓途辙不同而同期于道也。

又在《通说为邱君题南乐官舍》说——

凡人之性，必有所近，亦必有所偏。偏则不可以言通。古来人官物曲，守一而不可移者，皆是选

也。薄其执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鹜以求通，则终无所得矣。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所能勉者，因以推微而知著，会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同上卷八第四十六页。

这所谓“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所能勉”“取其意之所诚然而中实有不得已者力求其至”，实在可说是为学的最好方法。实斋先生的所以专攻史学，也因为审察自己的性情与史最为相近的缘故。他在《家书二》上说——

至论学问文章，与一时通人全不相合。盖时人以补苴襞褊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而甚知爱重，咨于善者而取法之，不强其所能，不欲自为著述以趋时尚，此吾善自度也。同上卷九第六十八页。

近来的人颇多赞扬实斋先生的史学，但对于他所说的史学究竟是什么，似乎没有十分明白。他在《上朱大司马论文》上，曾辨明史学与非史学的区别说——

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章氏遗书补编》第三十三页。

又在《家书二》辨明自己与刘知幾的不同说——

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章氏遗书》卷九第六十八页。

又在《家书三》说——

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同上卷九第六十九页。

这可见他所说的史学，是另有一种极精微的学问；近人专以史例推崇实斋先生，可谓不能深知实斋先生的了。但他所谓史学究竟是什么呢？他曾在《答客问》上说——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

实斋先生的论史，不拘拘于类例；他的论文，也不拘拘于格式。他曾在《与邵二云书》中说——

仆持文律，不外清真二字。清则气不杂也，真则理无支也。此二语知之甚易，能之甚难。同上卷第十九页。

又在《文格举隅序》中说——

古人文无定格，意之所至而文以至焉，盖有所以为文者也。文而有格，学者不知所以为文而竞趋于格，于是以格为当然之具，而真文丧矣。同上卷二十九第六页。

又在《赵立斋时文题式引言》中说——

余惟古人文成法立，如语言之有起止，啼笑之有收纵，自然之理，岂有一定式哉？文而有式，则面目雷同，性灵锢蔽，而古人立言之旨晦矣。同上卷二十九第八页。

又在《丙辰札记》中说——

韩昌黎之论文，则曰“文无难易，惟其是耳”；余亦谓文无古今，惟其是耳。杜工部之论